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公报(第四号)

——国家贫困县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情况

国家统计局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2月25日

根据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结果，国家贫困县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现将国家贫困县及其所辖的1.2万个乡、17.0万个行政村（包括建档立卡户的居委会、社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情况公布如下：

一、生产生活基础设施

国家贫困县中，通硬化路的行政村比重99.6%，其中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动力电的行政村比重99.3%，其中大电网覆盖范围内行政村全部通动力电；通信信号覆盖的行政村比重99%；通宽带互联网的行政村比重99.6%；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的行政村比重99%；有村级综合服务设施的行政村比重99.0%；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行政村比重62.7%；全部实现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比重65.5%，部分实现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比重31.9%；全部实现垃圾集中处理或清运的行政村比重89.9%，部分实现垃圾集中处理或清运的行政村比重9.0%。

二、医疗卫生设施及服务

国家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所在辖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在县级，至少有一所县级公立医院（含中医医院）的县比重99.8%，其他县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至少有一所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县比重98.0%，其他县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设有县级医院的，至少一所县级医院每

个专业科室有执业医师的县比重99.8%。各县普遍实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县域内“一站式”结算，开展大病专项救治工作。

在村级，所在乡镇有卫生院的行政村比重99.8%，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可不设置的行政村比重0.2%。所在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达标的行政村比重98.9%，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不作要求的行政村比重1.1%。行政村所在乡镇有执业（助理）医师。有卫生室或联合设置卫生室的行政村比重96.3%，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可不设置的行政村比重3.7%。卫生室服务能力达标的行政村比重95.3%，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不作要求的行政村比重4.7%。行政村有乡村医生或执业（助理）医师。

三、教育文化设施及服务

国家贫困县中，义务教育方面，有小学的乡镇比重98.5%，有小学（教学点）的行政村比重47.7%；所有的县均有初中，有初中的乡镇比重70.3%；有寄宿制学校的乡镇比重94.1%。非义务教育方面，有幼儿园的行政村比重46.2%；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县比重82.4%；有技工院校（包括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等）的县比重18.7%；有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县比重84.5%。

国家贫困县中，有公共图书馆的县比重98.1%，有综合文化站的乡镇比重99.4%，有图书室或文化站的行政村比重98.9%。

注释：

[1]国家贫困县，包括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享受片区政策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7个市县视作国家贫困县进行普查。

[2]普查的行政村，包括国家贫困县的全部行政村和有建档立卡户的居委会、社区。普查的行政村范围不局限于相关职能部门确定的扶贫政策实施范围。

[3]本报中所有县比重和“有小学的乡镇比重”“有初中的乡镇比重”“有综合文化站的乡镇比重”数据为2019年末时点的数据，其他数据均为普查登记时点的数据。第一批普查登记时间为2020年7月至8月，第二批普查登记时间为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

[4]本报中数据四舍五入保留一位小数。

[5]“通硬化路”，指乡镇政府所在地或上级路网至行政村村委会驻地或村小学通硬化路。

[6]“通动力电”，指通有动力电，能够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7]“通信信号覆盖”，指可以通过接收较通畅的无线电信号实现与外界联系。

[8]“通宽带互联网”，指通过宽带连接到互联网获得网络信息。

[9]“广播电视信号覆盖”，指铺设设有线电视光缆或安装了有线电视接收装置，包括自行安装设备接收电视信号，能正常收看电视节目。

[10]“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指在村级层面建立的，面向村民提供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环境、法律、安全等公共服务的综合性、多功能设施。

[11]“集中供水”，指从水源集中取水，视必要经净化和消毒后，通过配水管网输送到用户或集中供水点的供水形式。

[12]“垃圾集中处理或清运”，指本村地域内拥有垃圾处理设施，或者虽然没有垃圾处理设施，但是有垃圾回收房、固定位置垃圾桶等设施，并对垃圾实行统一集中清运。

[13]“电子商务配送站点”，指为网上购物等新型商品交易模式服务的配送站点。不包括不提供配送服务的快递代收点。

[14]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指符合各省份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委《关于印发解决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卫扶发〔2019〕45号）指导标准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省级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保障贫困人口有地方看病、有医生看病。

[15]“有小学（教学点）的行政村”，指本行政区域内有经县级以上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教学机构。由于越来越多农村适龄儿童选择到城镇上学，各地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布局调整和撤并，因此并非所有的行政村区域内都设有小学（教学点）。

[16]“寄宿制学校”，指可以为一定数量的学生在就读期间提供住宿的学校。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

（上接5版）

四 大国的担当

2017年3月24日，北京东北四环，一座白色小楼。

会议室里，一方是国务院扶贫办主要负责人，一方是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在中国反贫困经验的总结及交流推广、扶贫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

“中国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最大贡献者。”曾到访中国贫困地区的盖茨说，中国脱贫攻坚的创新经验和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戴上草帽，扛起锄头，背上竹篓，在海拔1800多米的田间地头播种、除草、浇水……这是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奈斯在云南昆明市东川区园子村的日常生活。奈斯在中国生活了23年，其中8年住在乡村。

东川区曾是昆明市唯一的深度贫困县。奈斯2012年搬到园子村时，他住的房子没通自来水，从昆明市区到村里要5个小时。现在，随着公路建成，车程缩短到2个半小时，村里的危房得到改造，村民家中接通宽带。

村民们走出大山的同时，越来越多游客来到园子村，村民多了增收途径。奈斯常与驻村的扶贫干部交流如何发展农业、旅游，很敬佩他们。

“得益于这些驻村干部的勤奋工作，中央政策得以快速有效落实，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奈斯说。

2018年春天，北京中南海，一间会议室。

华北某省的书记、省长，坐上了“被约谈席”。

为压实责任，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下了脱贫攻坚“军令状”。最终考核分四档：“好”“较好”“一般”“较差”。华北这个省因为“差”，被约谈。

随后一年，这个华北省份正视问题，狠抓脱贫攻坚落实，当年考核由“差”转“好”。

不仅省部级领导被党中央约谈，脱贫攻坚的“一线指挥官”县委书记也曾被党中央直接约谈。

2020年4月13日，中西部11个省区24名县委书记被约谈。

“约谈既是督战和加压，也是信任和加油。”主持这次电话约谈会议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要较真碰硬整改问题，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切实担负起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责任。

“利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和严格的监督考核，是中国精准扶贫壮举背后的制度原因之一。”印度汉学家、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说。

“为了吸引企业，中国政府鼓励富裕的沿海地区与贫困地区结对子。总部设在厦门的凯琳鞋业集团2019年在甘肃南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开设了分公司。90名女工在那里工作，其中70%来自贫困家庭，工资在每月2000—4000元。”

法国《世界报》记者2020年在题为“中国农村赤贫即将消失”的报道里，介绍中国的“结对子”扶贫。

这种在西方读者看来颇为独特的做法，在中国有个广为人知的名称——“东西部扶贫协作”。

2021年1月，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马文祥和村里人在追热播剧《山海情》，看到剧中第一个参与双孢菇种植、向福建专家学技术的马得宝，他心生亲切——这不就是当年的自己吗？

“看到白花花的蘑菇种出来，确实激动，和电视剧里一模一样。”63岁的马文祥说，听到剧中并不标准的西海固方言他们会笑，笑着笑着有人就落泪了。

1997年，牵头负责闽宁协作对口帮扶的习近平，到宁夏实施一项重大工程“吊庄移民”：让生活在土地贫瘠的西海固群众，搬迁到贺兰山脚下的黄河灌区。他为移民村命名“闽宁村”：“闽宁村现在是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

这一年，马文祥作为第一批吊庄移民，一家十口人从大山搬迁到闽宁村。这些年，宁夏近百万群众从南部山区搬了出来，光闽宁村就接收了4万多名移民。

今天，闽宁村已升级为拥有6万多人的闽宁镇，培育出菌菇、酿酒葡萄等特色产业，人均纯收入超过1.4万元。

绵延24年、跨越2000多公里的闽宁协作，不仅让闽宁镇从无到有、从穷到富，还带动了曾经苦瘠甲天下的地区山乡巨变，一个山绿民富的西海固呼之欲出。

对口帮扶，东西互通，南北相助，不仅输送资源，也传播理念。

偏远贫困的山区，活跃着“北京医生”“上海老师”，迎来了“广东老板”“浙江工程师”……以东部之优补西部之短，以先发优势促后发效应，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激发贫

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奋起直追。

东西部扶贫协作20多年来，已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83岁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十届中央总书记本扬，珍藏着一本书——习近平的《摆脱贫困》。

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老挝也确定到2020年实现脱贫的目标，和中国的时间进程遥相呼应。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老挝时，中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番对话推心置腹——

本扬说，老挝农业自然禀赋较好，但受限于资金和技术。

习近平回答说，农业领域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不仅可以帮助老挝发挥自然优势，还可以帮助更多人摆脱贫困。

此后两年，本扬两度访华，赴大山深处的十八洞村，考察“精准扶贫”，又去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工作过的福建宁德，学习“弱鸟先飞”经验。

2020年国际消除贫困日前夕，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

“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是中国自身取得的成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感叹，中国面向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采取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政策，这是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另一贡献。

2021年2月3日，立春。

位于乌蒙山腹地的贵州毕节市黔西县化屋村，路边油菜花悄然盛开，房前樱桃树含苞待放。

“总书记春节前来我们这里看望，祝我们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苗族村民赵玉说，总书记在她家楼上楼下看了个遍，询问家里用电、吃水、经济收入等情况。

老赵以前的家，透风漏雨，没水没电，4年前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帮助下，住进15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夫妻二人在福建打工，一年收入4万多元。3个孩子读初中、小学，学费、住宿、吃饭免费。

拉长时间轴，乌蒙山30余载变迁，何其壮哉。

“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上世纪80年代，新华社记者刘子富关于乌蒙山区赤贫的报道，惊动中南海。之后，中央批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30多年累计减贫630多万人，毕节承载了为中国扶贫探新路的使命。

今天，走进毕节一些乡村，总听到干部群众说：“匝道经济”“订单大米”“乡村跑腿”“后备厢经济”……这些热词诠释了当地对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

五 光明的前路

2021年2月3日，立春。

位于乌蒙山腹地的贵州毕节市黔西县化屋村，路边油菜花悄然盛开，房前樱桃树含苞待放。

“总书记春节前来我们这里看望，祝我们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苗族村民赵玉说，总书记在她家楼上楼下看了个遍，询问家里用电、吃水、经济收入等情况。

老赵以前的家，透风漏雨，没水没电，4年前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帮助下，住进15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夫妻二人在福建打工，一年收入4万多元。3个孩子读初中、小学，学费、住宿、吃饭免费。

拉长时间轴，乌蒙山30余载变迁，何其壮哉。

“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上世纪80年代，新华社记者刘子富关于乌蒙山区赤贫的报道，惊动中南海。之后，中央批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30多年累计减贫630多万人，毕节承载了为中国扶贫探新路的使命。

今天，走进毕节一些乡村，总听到干部群众说：“匝道经济”“订单大米”“乡村跑腿”“后备厢经济”……这些热词诠释了当地对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新起点上再出发，要扎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初春暖阳照耀，大红灯笼高挂，农家乐小院传出阵阵欢笑声，吕志和妻子忙着给客人上菜。“要在半年前，谁能想到我们还能笑着迎接新年。”他说。

吕志一家曾是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镇富裕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政策帮扶下，他们家养羊、种蔬菜大棚，还贷款经营起农家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但2020年夏天，一场火灾烧毁了吕志家农家乐。面对重回贫困的绝境，当地启动返贫帮扶，一笔笔资金带来生活的希望，吕志家的农家乐在2020年10月底重新开业。他感慨：“以后都是好日子啦。”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中国已经动起来。

肩背比人还高的巨大行囊，一手拎着破旧双肩包，一手抱着襁褓中熟睡的孩子，眼神刚毅坚定地望着前方……

11年前，一位年轻母亲在火车站准备返乡的照片，让万千读者泪目。

前不久，感动中国的“春运母亲”找到了。

这位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瓦岩乡桃园村的妇女巴木布木，当年艰难地外出务工，“就是希望孩子能过上好日子、走出大山”。

回乡后的巴木布木和丈夫试着种烟叶。在扶贫干部、技术人员等的帮助下，拼出了渐渐红火的日子，她所在的桃园村也脱贫了，通了路、电、网、自来水。

巴木布木又有新梦想。

过完舞龙年后，2月，她来到位于福建沿海的霞浦县，与丈夫巫石且和丈夫的妹妹、妹夫会合，开始渔排海参养殖。

巴木布木说：“仍然要努力工作，让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新起点上再出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1年2月16日，一篇署名“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的文章引发关注，这意味着国家乡村振兴局已接过新的历史接力棒。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向全党全社会发出明确信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div